

# 書稿大綱

## 一、基本資訊

- 書名：《意象的拼圖》
- 作者：涼風
- 字數：約 10 萬字
- 完稿進度：繁體版已付梓，繁體版可提供完整書稿

## 二、內容簡介

本書以「意象」為核心，探討華語文本中語言與認知圖像的交互建構。作者首創「意象拼圖」理論，提出中文由 **84** 個意象字母為基礎層級，透過「認知 4 規則」貫穿支配，從漢字組合、多字詞到詞組、單句與複句，層層拼組而成完整的文法體系。換言之，從詞法到句法，認知規則始終貫穿於各語言層級之中，形成獨特的中文建構邏輯。全書融合符號學、認知語言學、認知心理學及華語教學實踐，

為跨文化語境下的文本解讀提供一套全新的分析框架，既具理論開創性，亦富教學應用價值。

### 三、全書結構與章節提要

#### · 第一章 緒論：認知科學視野下的中文文法革命

緒論主要掃除過去以來的背景障礙，從西方語言學的局限性到傳統文字學的「聲符」誤讀進行批判，並引入認知科學作為新的理論基礎及分析工具，將語言現象轉向「認知」理解問題。

#### · 第二章 基本原理 — 漢字創造的認知密碼

從歷史源流開始探討漢字表意原理，最後再通過認知語言學完成漢字的表意性原理的構形解碼，紮實中文構詞學的理论基礎。

#### · 第三章 結構與組合：形意系統的工程藍圖

主要探討漢字的構形結構及其組合認知規則。透過八千常用通用楷書漢字樣本，歸納出五種組合認知模式。證實了漢字是經驗意象的心理表徵，並通過這個表徵理解（隱喻）字義，包括字的多義。

#### · 第四章 探尋意象的規範：構形解碼的認知現場

主要為探尋漢字構形的意象提供理論規範及可操作的方法，使探尋出來的構形意象具有科學理據性和系統性。

## · 第五章 《莊子》核心概念的意象解讀

主要利用字詞的表意性解讀經典——以《莊子》十個核心概念為例。這是一種理論應用。

## · 第六章 多字組合：詞法到句法的認知跨越

主要探索多字詞與向句法跨越的詞組的組合認知規則。印證從詞法到句法，認知規則一脈相通支配中文文法規則。

## · 第七章 文句組合：句法規則背後的認知意義

透過大量的體例，探索單句、複句中的組合規則，包括各種語言現象如中文的特殊的量詞現象等。再次驗證認知規則在句法分析中的解釋能力。

## · 第八章 語言本質 — 認知在物質界面上的代碼化系統

提出一個更概括的關於語言本質的理論 — 代碼化系統，它連接了心智與世界、個體與社會、形式與功能、穩定與變化。在這種視角下，它超越了語言表層的詞序規則，從認知心智層面解釋語言規則，使語言研究不再是孤立的學科遊戲，而是理解人類本質的核心事業。

· 附件一

84 個形意素（詞素）表

## 四、本書特色與學術價值

1. 理論創新：首次提出「拼圖理論」，打通傳統小學與當代認知科學的對話。
2. 實踐導向：理論分析與華語教學應用並重，適合研究者和一線教師參考。
3. 跨領域視野：融合文字學、語言學、符號學與教學法，拓展華語文本研究的邊界。

## 五、目標讀者

1. 華語教學系、中文系師生。
2. 海外孔子學院教師與研究人員。
3. 語言學、符號學研究者。
4. 跨對文本分析感興趣的一般讀者。

## 六、關於繁簡體版出版的設想

鑑於本書的專業性與讀者群的特點，建議採用「按需印刷」模式出版。這樣既

能藉助貴社的專業品牌與發行渠道觸達核心讀者，又能有效規避學術書的庫存壓力，實現長期穩定的銷售。

## 七、關於《意象的拼圖》樣章

### 第一章 緒論：認知科學視野下的中文文法革命

世界上的語言研究，發端於希臘-羅馬、印度與中國「小學」這三大傳統，無不以書面語為核心。自索緒爾（Saussure）以降，西方語言學攜科學方法論之威，將印歐語系研究推向高峰，建構了現代語言學大廈。然而，自《馬氏文通》（1898）首次將這套理論體系引入中文研究以來，一百二十餘年的探索卻始終深陷泥潭，成效不彰。其根本原因，不在於學者不努力，而在於我們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一套與研究對象本質相悖的理論工具，導致整體學科建構在一個錯位的基礎之上。

其根源，在於一場深刻的「雙重錯位」。

首先，是理論基石的錯位。現代語言學本質上是印歐語系，即表音文字的理論概括。在這種體系中，文字是記錄語音的符號，構形依據是音韻規則，形與義之間是任意的、約定俗成的關係。而漢字是表意文字，其構形直接源於對詞義的理解與編碼，形與義之間存在著理據性的連結。試圖用前者的理論框架來解剖後者，如同用尺子去丈量重量，工具與對象從根本上就不匹配。這種錯位導致了中文文法研究長期以來只能在表層進行現象描述，無法深入系統的內在機制。

其次，是解釋體系的失靈。這不僅指西方理論的水土不服，更指向傳統漢字研究自身的天花板。即便是奉為圭臬的「六書」理論，面對九成以上的楷書字形——尤其是形聲字——其解釋力也已捉襟見肘。它無法系統、完整地闡明構形與字義，尤其是一字多義之間的理據關聯。倘若漢字構形不能圓滿地解釋字義，那麼「表意文字」這塊基石本身就會動搖。更嚴峻的是，作為文法基礎的「詞法」（構詞法）始終未能建立在漢字構形這一最客觀的現象之上。那麼，在此沙灘上構築的「句法」大廈，其穩固性自然可想而知，長期以來的中文文法體系實則是一座沒有地基的空中樓閣。

面對這一困境，近代學者並非沒有嘗試突破。清末民初的「章黃之學」提出

「以聲音通訓詁，以訓詁析形義」，<sup>1</sup>試圖通過古音這座橋梁連接形與義。這條路徑在考釋個別字詞上雖有貢獻，但在方法論上存在根本缺陷：它預設了音與義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可追溯的理據關聯，卻選擇性忽略了兩個冰冷的客觀事實——第一，字形與字音之間本無理據關係，語音是社會約定的產物；第二，漢語同音字眾多，音與義絕非唯一對應。這使得「因聲求義」在很大程度上淪為缺乏客觀標準的推測，充滿主觀臆測，反而遮蔽了「構形表意」本身才是唯一可靠、可驗證的研究起點。

於是，漢字研究陷入了一場尷尬的僵局：傳統的「六書」工具箱已然陳舊，無法應對楷書系統的複雜性；而「章黃」的新闢路徑又導向歧途，遠離了字形本體。其結果便是，卷帙浩繁的現代學術著作，大多停留在對語言現象的細緻描述，或對文獻用例的歸納分類，而非對漢字創造與理解的原型機制進行解釋。我們對漢字如何通過構形系統表意，其內在的組合機制為何，字與字如何基於共同的認知邏輯組合成詞、成句，依然知之甚少。這個「詞法黑洞」產生了致命的連鎖反應。對於表意文字而言，<sup>2</sup>字詞內部的構形組合（詞法）與字詞之間的句法組合，在底層認知邏輯上是同構的、連續的。前者是微觀的意義編碼，後者是宏觀的意義組裝。前者不明，後者必然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破解漢字構形表意的密碼，不僅是文字學的任務，更成為解開整個中文文法之迷的唯一鑰匙。

那麼，出路何在？

本書的主張是：中文文法研究必須進行一次徹底的範式革命。我們必須勇敢地拋棄那套不合身的西方理論外衣，回歸到「漢字構形」這一最根本的客觀現象本身，並為其尋找一個真正適配的理论透鏡——現代認知科學。文字是人類的發明產物，其構形是設計的成果。漢字的構形設計，本質上是將人們對字義的認知與理解，編碼為一個視覺符號的過程。這背後必然深刻地反映了人類共通的概念形成、隱喻思維、場景記憶（基模）及整體感知（完形）等認知規律。因此，認知科學非但不是外來的強行嫁接，反而是破解漢字表意密碼的原生性鑰匙，因為它直接研究心智如何表徵和處理意義，而漢字正是認知意義的視覺符號化凝結。

基於此，本緒論將遵循一條從批判到建構的清澗路徑：首先，我們將徹底疏理障礙，釐清西方語言學理論的內在邏輯及其與漢字本質的根本性衝突，打破「語音中心主義」的迷思。接著，我們將批判性繼承傳統，重返傳統小學，審

---

<sup>1</sup> 章黃之學，繼承乾嘉樸學傳統，以音韻為樞紐，強調「因聲求義」，通過古音研究探求字義源流。

<sup>2</sup> 對表音文字而言，由於印歐語系仍延用語音編碼來為其造詞，也就是利用音韻規則編碼詞彙，使得文字詞彙與其詞義之間仍為任意的約定關係。印歐語系只有進入句法階段才借由認知規則支配「詞序」。

視「六書」的成就與盲點，特別是剖析「聲符」概念的千年誤讀，明確我們必須攻克的核心問題在於系統性還原構件的表意功能。最後，我們將系統引入認知科學的理論工具，詳細闡釋概念分類、概念隱喻、基模理論和完形心理如何為我們提供一套強有力的解釋框架，從而為構建一個全新的、從「詞法」貫通到「句法」的中文認知文法體系，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這場旅程的目標，不僅僅是解釋一個個孤立的漢字，而是要揭示整個中文書寫系統從字內構件、到詞、到句，各個層級賴以運行的、統一的認知法則，最終實現中文文法研究的主體性回歸。

## 一、西方語言學的局限性：當表音文字的鏡片，對上表意文字的真實

我們深知，任何科學理論都有其誕生的土壤和適用的邊界。西方現代語言學是一套極其精緻、自洽的體系，但其真正的局限性，並非其本身有誤，而在於它是一套為表音文字（尤其是印歐語系）量身定制的解釋體系。當這套體系被奉為普世真理，不加批判地強行用於觀察和分析漢字時，它非但不能帶來光明，反而成為扭曲事實的哈哈鏡，使得漢字的真實樣貌——表意性、意象性、系統性——變得模糊甚至畸形。

### 1. 語言行為的單一通道迷思與語音中心主義

西方語言學自結構主義以來，將我們內在的語言知識（Linguistic competence）視為「語言能力」，且將這種語言能力奉為研究核心，這本身是現代語言學科學化的重要標誌，無可厚非。但語言能力是無法看見的，能直接觀察到的是我們的語言行為（Linguistic performance）；換言之，語言能力與語言行為中間常有差距；語言能力是語言行為的概括，語言行為反映語言能力；我們研究語言能力只能透過語言行為（現象）進行。因此，語言能力才是語言的本質，語言學主要研究有系統的語言能力。<sup>3</sup>然而，西方語言學透過語言行為具體研究語言能力時，隱含了一個未經充分反思的重大預設：語言行為幾乎等同於語音行為。無論是索緒爾對「語言」與「言語」的區分，還是喬姆斯基的「普遍語法」，他們所關注的直接對象，幾乎完全集中在口語行為上（言語）。文字，在他們的主流理論框架中，被視為次要的、衍生的符號系統，僅僅是語音的「附庸」或「複制品」，是語音的「記錄」，是「符號的符號」。<sup>4</sup>之所以這樣，是其來有自的：印歐語系本為表音文字，語音與其文字間是合二為一的。這是一種深刻的「語音中心主義」。它將人類豐富多彩的語言表徵形式，強行

<sup>3</sup> Victoria Fromkin · Robert Rodman · Nina Hyams 著，謝富惠等譯，《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語言學新引》，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2011年8月，398-399頁

<sup>4</sup> 這是對亞里士多德的一個說法的歸納，他認為說話是表達心靈的符號，而文字是記錄說話的符號。

壓縮並等同於單一的聽覺通道。事實上，人類的語言行為其外在表徵是一個多元的「符號家族」：口語是聽覺—發聲通道的，文字是視覺—書寫通道的，手語是視覺—手勢的，盲文則是觸覺通道的。它們猶如不同的樂器，雖然物理介質與操作規則各異（構詞方式各異），卻都能獨立且有效地演奏出同一首交響曲——承載並表達人類複雜的思想與認知意義。既使作為約定的符號——數學符號，也並不受制於語音，它是純粹書寫符號；數學語言、算法和計算機語言都是「普遍文字」，都區別於自然語言——這些科學實踐的事實不符合文字的拼音化方案，也不以拼音文字為科學研究或哲學認識論的前提條件。因此，將語言研究狹隘到等同於「語音行為」研究，等於在理論起點上就主動關閉了視覺通道；這從一開始，就為理解漢字這類視覺表意系統的本質關上了大門。當我們只帶著耳朵（如只通過漢語拼音或注音符號）去研究一種為眼睛而設計的符號系統時，其謬誤可想而知。

## 2.文字發明：摹音還是表意？一個決定文明走向的分岔路口

人類出於跨越時空傳遞信息、記錄事務、積累知識的迫切需要，發明了文字。這項偉大發明，無論是蘇美爾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還是中國甲骨文，都是從繪製物體外形，即象形文字開始的。但隨著人類對世界的認識不斷深入，大量抽象概念不斷湧現，而抽象概念沒有外形，這種繪製事物外形的方法則無以為繼了。於是，人類站上了歷史的十字路口，面臨著一個根本性的路徑選擇：是選擇摹寫語音的表音之路（表音文字如語音，不涉及抽象概念），還是選擇繼續走向描繪意義的表意之路（顯然困難重重）？

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對此做了精闢的區分，他指出世界上的文字體系從原理上只有兩種<sup>5</sup>：

⊙表意體系：一個詞只用一個符號表示，而這個符號不取決於詞賴以構成的聲音。其典範，就是漢字。

⊙表音文字：目的是把詞中一連串連續的聲音摹寫出來。字母文字、音節文字皆屬此類。

這不是文明程度的高低或優劣之別，而是編碼理據的根本不同，根源在於不同文明對如何外顯語言的不同抉擇。印歐語系的主流選擇了表音文字，其文字本質上是語音的「樂譜」，即字形與字音同構（拼寫反映讀音）；重點是這種方式適合印歐語系的特點：印歐語系音素明晰，易於以代表音素的字母拼合；而且，與語音一樣可以表徵抽象概念。結果就是，文字構形與其語音二者共同與語義建立任意的、約定俗成的關係（即索緒爾所說的「符號的任意性」）。因

---

<sup>5</sup>Ferdinand de Saussure 著，高名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85，50-51p

此，西方語言學的詞法（如屈折變化、派生）、句法（如詞序、一致性關係），本質上是對口語中的語音規則、形態規則和詞序規則的理論概括，其根基在於「聲音的組合」。

而漢字，則頑強地、一以貫之地走上了表意之路。一個漢字，不是一組聲音的拼圖或錄音。例如「書」字，其構形描述的是「手握筆桿（聿），書寫言辭（曰）」的完整意象。這種文字的本質，是對詞義概念的理解與經驗意象的心理表徵進行視覺編碼。它的直接關聯對象是「意義」和「意象」，而非「語音」。它更像是直接對認知經驗的意義「拍照」。它之所以能夠成為可能，源於不自覺地利用了認知規則而組合出能表意及表徵詞義的意象。

於是，一個巨大的鴻溝產生了：西方語言學的理論基石，是音韻規則、形態規則和詞序規則；而中文語言學的理論基石本應植根於認知規則，包括基於認知規則下的構詞、構句等。企圖用前者的基石來丈量後者的大廈，其結果只能是整體的傾斜與崩塌。西方語言學無法為中文文法提供有效的理論基礎，這不是它的失效，而是它超越了自身的應用邊界，是一種理論的「越界使用」。

### 3. 「語文一致」的時代浪潮和中文文法主體性的沉淪與覺醒

近代以來，在救亡圖存、啟蒙思想的大背景下，「語文一致」運動席卷中國，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成為書面語主流，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普通話被推廣。這無疑極大促進了教育普及和社會溝通，為語言研究提供了相對統一的共時材料。但與此同時，它也無意中強化並傳播了一個深刻的誤解：彷彿漢字終於像英文一樣，成了記錄語音的純粹工具，漢語的「語音」與中文的「字形」似乎合二為一了。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漢語的「語音」與中文的「字形」，在本質上是兩套並行且性質迥異的符號系統。它們在歷史長河中通過社會約定產生關聯（某字形約定讀某音），但並未合二為一。一個「書」字，北京人讀 shu，廣東人讀 syu1，吳語地區讀法各異，日本人讀音為 sho，訓讀為 kaku，但他們對這個字形所承載的「書寫行為」或「書寫結果」的核心意象的理解，卻是大致相通的。字音是區域性、時代性的社會約定附著物，而形義關聯則是跨時空、相對穩定的認知結構體現。

於是，漢語的言語之詞與書寫之「詞」理應加以區分，也就是「詞」與「字」的關係需要釐清。因為「字」與「詞」的關係爭議了上百年，傳統中文只有「字」概念；而西方語言學有「詞」而無「字」概念。而今，我們很清楚：印歐語系的言語和書寫系統，即這兩種語言行為是合二為一的，因為印歐語系的表音文字是依據其語音的音韻規則編碼的，即表音文字與其語音是同構的。而漢語的言語和書寫系統卻是兩套並行且性質迥異的語言行為，因為漢語的書寫文字不是表音的，而是表意的。因此，漢語的言語之「詞」稱為語詞，書寫之「詞」稱為字詞；兩者雖然都是句子意義的獨立基本單位，但表徵符號的編碼

理據卻大為不同：漢語的語詞採用拼音或注音符號（表音文字），而漢語的字詞卻採用漢字及其組合的多字詞（表意文字）。惟我們研究的重點是後者，即字詞或中文書寫系統。

另外，西方語言學常用的結構或成分分析科學法仍值得我們借鑑，包括共時和歷時概念的區分。語言學裡，無論是語音成分分析（結構分析）、構詞成分分析、句子結構分析，還是語意成分分析等等，不外是對研究對象（現象）的結構分析，以至找出最小要素及其組合規則，是我們建構科學理論的基本範式。因此，我們首先就要確定，研究的現象（對象）究竟是什麼？有關漢語的字詞（中文），它的讀音來自社會的約定（如普通話或國語），它的詞義來自語言（言語）；惟有它的構形，為何如此構造形態，是需要我們深入探究的。因為它的設計理據，也就是它如何表意的，我們並沒有徹底研究清楚。顯然，字詞的構形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它也是書寫系統最客觀的語言現象。

不僅如此，語言學的共時、歷時概念對我們也深具啟示。這對我們分清語言現象（語言事實），以確定客觀研究對象具有指導作用。例如，漢字從歷時看有甲骨文、金文、大小篆及隸楷等字體，惟作為研究的客觀現象，我們只能以共時平面的字體為研究對象，因為不同的字體代表不同結構的客觀現象：同一漢字的不同字體的構形，結構不同就意味著不同的時期的不同設計理念。因此，我們不應該把同一漢字不同字體的構形視為同一現象，尤其不能把同一漢字的不同字體間的理據相互解釋，儘管它們之間的字義具有傳承關係。例如，不能用甲骨文的象形理據拿來解釋楷書字體的構形理據；因為古漢字與今漢字的構形不是同一現象。因此，本著越近的字體越具有更多確定性的理念，我們把隸楷字體的構形視為研究的客觀現象或對象（當然也可以把其他字體設定為研究對象，只要不把不同字體視為同一現象即可）。

因此，中國語言學必須確立自己的主體性，應擺脫對印歐語的語法體系的依附性模仿。這個主體性的起點，就在於承認並深入研究漢字作為表意系統的獨特性。傳統文字學需要革命性升級，其核心任務是破解字形如何系統性地編碼意義的認知規則；而由此建立的、基於意象組合的詞法，與由此衍生出的、反映認知組合模式的句法，將共同構成中文文法的獨特體系。這套體系與印歐語系的「語法」並行於世，它們是為解決不同性質的符號系統（表音 VS 表意）問題而發展出的兩套方案。兩者之間沒有高下之分，只有真假之辨——即理論是否忠實於自己的研究對象，是否揭示了對象的本質運作機制。

## 二、漢字構形研究的盲點：被「聲符」遮蔽的認知真相

打開任何中文文本，映入眼帘的，是一個個由線條於空間構成的、具有強烈視覺獨立性的單元——漢字。它們是構成中文句子的意義基石，是思想的基本「積木」。然而，當我們追問這些構形「所為何來」，試圖理解其構形與字義之間的內在聯繫時，卻發現研究之路迷霧重重。這迷霧，並非來自證據的缺

失，而是源於根深蒂固的理論盲點與概念誤讀，其中最關鍵者，莫過於對「聲符」的迷信。

## 1. 「六書」的解釋力黃昏與「聲符」概念的千年集體幻象

傳統漢字研究，兩千年來始終在許慎《說文解字》「六書」理論的古典光輝之下。象形、指事、會意三書，直觀而富有認知魅力，揭示了早期漢字「畫其成物，隨體詰詘」或「比類合誼，以見指撝」的構形原則；轉注、假借，則關乎字詞的引申借用之法。唯獨占據現代楷書九成以上的形聲字，其解釋在「六書」框架內陷入了長期的困境。

許慎將形聲字定義為「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這一定義本有極大的闡釋空間。然而，後世學者幾乎不假思索地、機械地將「取譬」狹隘地、單一地理解為「取音」，從而鑄造了「形符表義，聲符表音」的二分法，並將「聲符」這一概念奉為圭臬，視為形聲字的天經地義。然而，這實為一場持續千年的集體性誤讀，其根源在於對許慎用字「聲」的片面理解，以及對漢字表意系統完整性的不自覺割裂。

首先，從訓詁上審視，「聲」字古義本就豐富，常包含「名聲」、「聲響」、「宣稱」、「語義」等多重內涵，並非單指物理語音。「取譬相成」完全可以是其「取其特徵、譬喻以成全其義」，即通過一個具有某種意象特徵的構件來譬喻、說明字義。李運富等學者對此已有卓見<sup>6</sup>指出「聲」在早期文字學表述中常與「名」、「義」相通。

其次，從邏輯與實踐上考量，若聲符僅為純粹表音成分，則形聲字的構形便自斷一臂，其表意機制是不完整的、殘缺的。在大量同音字並存的漢語現實中，古人為何偏偏選擇「工」來為「江」注音，而不是「公」、「弓」等同音字？選擇「可」來為「河」注音，而不是「科」、「珂」、「苛」？答案只能是：這個選擇本身絕非任意，它就是表意活動的一部分，被選中的構件必然在意義或意象上與目標字義存在內在關聯。

以「江」、「河」為例進行深度認知分析：它們並非簡單的「水類」加「注音符號」。「江」從水從工：「工」的構形是聖人用圭表「日中測影連接天地巧於所能」的意象，引申為有法度、精巧、工程。在古人的認知世界中，長江（尤其是上游<sup>7</sup>）與著名的人工水利工程「都江堰」緊密相連，長江的馴服與利用體現了「人工巨構」的偉力。「工」在這裡貢獻了「人工的」、「有規模的」、「精巧構築的」核心意象，與「水」旁結合，共同指向這條具有非凡自然力且被人類工程深刻介入的特大型水系。「河」從水從可：「可」字從口從丁，「丁口」本為字詞，指人口，如丁口冊（戶口名簿），有「肯許」、「能

<sup>6</sup> 李運富：〈「形聲相益」新解與「文」「字」關係辨證〉，《語言科學》，2017年第2期

<sup>7</sup> 在民國之前，中國古人一直認為「長江」上游是岷江，而非現今所認定的「長江」上游。這一看法主要源自儒家《尚書·禹貢》中的記載：「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夠」之義；「可」在此隱喻了「養育人口」、「文明可依」的深層含義，而黃河被稱為中華民族的搖籃，正是滋養人口、承載文明的母親河。「可」在此完美參與了表意。

由此可見，傳統所謂的「聲符」，其本質是表意的「象符」或「意符」。它們與形符（部首）的關係，是「類」與「象」的協作，是「以事為名」（用部首畫定事物的大類範疇）與「取譬相成」（用另一個構件譬喻說明該類事物的具體特徵、來源、功能或狀態）的認知組合。將「工」、「可」等構件視為純粹的表音符號，無異於買櫝還珠，主動放棄了理解先民造字智慧與認知世界方式的一半鑰匙，也使得形聲字淪為半邊表意、半邊無理據的尷尬存在。「聲符」的理解破壞了漢字表意的完整性。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漢字的發音與其構形表音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任何文字都離不開「形音義」三要素。沒有語音就不能稱其為文字，這是文字的基本標配。同樣，每個漢字也有其發音，包括構成漢字的漢字。但漢字的發音是由社區約定的，具體而言是由各地漢語方言決定的（如日語、韓語、越南語等中也有其漢字的讀音）。因此，漢字的發音與其構形沒有關係。所謂構形表音是指文字構形與其發音之間具有理據關係，如漢語拼音或注音符號，或者印歐語係等的字母文字，包括音節文字等等。形聲字的「聲符」被認為是示音作用，這僅是一種功能上的判斷；但這種判斷並不被「聲符」的構形表意所支持，因為漢字一開始（即那些基本象形字符）就不是為語音的表音而設計，更不要說由這些基本字相互組合構成更為複雜的漢字；也就是「聲符」的構形與其語音之間沒有理據關係，因為它們的構形是表意的。如此一來，形聲字的「聲符」示音功能，只是一種一相情願的想法，並不能像漢字的部首受到其構形表意的支持。

## 2. 「右文說」的靈光一現與一場未被繼承的認知革命

歷史上，並非沒有敏銳的學者洞察到此中玄機。北宋學者王聖美（王觀國）提出的「右文說」，便是在「聲符」迷霧中一道耀眼的靈光。他提出「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認為形聲字的聲符（多居右）本身常常攜帶核心意義，同聲符之字往往有共同的意義範疇。例如，「𠂔」有「薄」義（並排陳列的「戈」如薄片），故從「𠂔」之字如「淺」（薄水）、「錢」（薄片之金）、「殘」（尸戈片野）、「賤」（薄錢低價）等皆含「薄」義。

歷史上被沈括《夢溪筆談》引為笑談的王安石《字說》「波為水之皮」，在認知語言學和隱喻視角下卻顯得無比精當。「皮」是動物軀體之表面覆蓋物，「水之皮」正是隱喻水的表面，而波浪正是發生於水體表面的物理現象。王安石的拆解，恰恰是自然現象「基模」的精準捕捉，是將具體的身體經驗（皮）映射到抽象自然現象（波）的生動隱喻。蘇東坡以「滑為水之骨」的反詰，作為機智的嘲諷固然巧妙，但反而暴露了其自身聯想的隨意性，未能理解隱喻映

射的系統性與理據性（「滑」字構形意象是「如帶油脂的骨頭」）。

「右文說」的偉大之處，在於它潛在地將漢字構形視為一個 100%表意的有機整體，打破了形符獨攬表意、聲符純粹示音的僵化二分。它是對「六書」中形聲理論的內在超越，是對被「聲符」概念無形中閹割了的漢字表意完整性的初步恢復。它指向了一條極具潛力的研究路徑：系統研究構件（包括所謂聲符）的意象網路與意義家族。可惜，這條路徑在後世因對許慎「某聲」公式的盲從、因系統歸納的艱巨浩繁、也因缺乏現代認知理論的支撐而未能深入，最終中斷，僅作為訓詁學中的一種局部觀察方法存續。

### 3.許慎的體系偉業與未竟之功：對系統性的呼喚與我們的使命

許慎被尊為「字聖」，是因為他做了一項空前絕後的基礎性工作：面對秦篆文隸變的混亂，他收集近萬字形，首創 540 部首，以「據形系聯」的方式編排，並對每個字進行了構形分析。他揭示了漢字構件（尤其是部首）的系統性雛形，即一系列具有概括性意義的符號標籤，統領一大批字。

然而，許慎的偉大，也反襯出後世研究的停滯與偏頗。他揭示了部首（形符）的系統性，卻未能將漢字的另一半構件（即後世誤認的「聲符」）的表意性同樣清晰、系統地揭示和歸納出來。他留下了「從某，某聲」的公式，本意可能是為了表明該構件與字音的關聯，但卻讓後人誤讀了重點，將「某聲」中的「聲」固化解讀為「僅示音」，忽略了這些構件在造字之初可能承載的「意象」或「特徵義」。

我們的歷史任務，正是要接續並完成許慎未竟的體系化事業。這不是在《說文》框架內進行修補補，而是要以認知科學為新的羅盤，以系統更成熟、更穩定的楷書字體為主要地圖，<sup>8</sup>對近萬常用通用漢字進行一次徹底的、大規模的「認知考古」或「逆向工程」。我們需要探明每一構件（無論它被正統教科書歸結為意符、聲符，還是記號）<sup>9</sup>所凝結的認知意象是什麼，它在不同字中如何通過與其他構件的組合，實現具體而微的意象構建。目標是重現那些完整、透明、自洽的漢字表意系統，讓每一個字都成為可理解的，而非半邊可解、半邊謎團的符號。

總之，「聲符」這個盲點若不根除，中文構詞學便永遠在黑暗中摸索。如果單個漢字（作為最基本的單音節詞，又稱單字詞）內部的構形表意原理尚且混沌不清，那麼由字與字組合成的多字詞（複合詞）的意義衍生規則，乃至由詞組組成句子的語法規則，又如何能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詞法與句法本是同一種認知邏輯——即人類如何對經驗進行分類、提取特徵、建立關係、組織意義——在不同語言層級（字內、字間、句內）上的連續性展現。前者是後者的

---

<sup>8</sup> 從歷時字體的角度，越後來的字體，確定性越多、系統性越成熟。因此，楷書是正體漢字的楷模，是迄今最後的字體。

<sup>9</sup> 裘錫圭先生認為字符有三類：意符、聲符及記號。

微觀基石與邏輯原形。唯有照亮字內部的認知黑箱，才能透視整個中文文法大廈的內部結構。

### 三、認知文法的新視野：打開漢字思維的鑰匙

文字的視覺編碼，從理據上無非兩種根本路徑：或摹其音，或表其意。表音文字是映摹語音的書寫系統，其規則（拼寫法）相對明晰，研究重點在於音系和形態；而表意文字是理解詞義、凝結意象的書寫系統，其機制的奧秘，卻深鎖於千年的黑箱之中。這不僅是中國語言學者的困擾，也觸及了一個關於人類心智表徵特性的普遍難題：意識如何將對世界的理解轉化為穩定的視覺符號？

喬姆斯基（Chomsky）曾言，<sup>10</sup>他研究語言的終極興趣，在於「透過語言的研究，去揭示人類心智的固有特性」。這條從語言通往心智的道路，同樣指引著我們對漢字的研究。要破解漢字表意的黑箱，就必須深入其背後的認知現實。語言是心智的鏡子，而漢字，作為一種純粹的、高度發展的意義視覺編碼系統，正是古代先民認知模式、概念結構、思維方式最直接、最系統的「化石」記錄。認知科學告訴我們，人類的思維並非一團亂麻，而是遵循著一些底層的、跨文化的、可探知的普遍規律。我們將引入四種關鍵的認知理論，它們並非並列的、隨意選取的工具，而是構成了一個從概念形成到意義建構的完整認知光譜，環環相扣，足以系統地照亮漢字從創造到理解的全過程。

#### （一）概念分類與範疇化：漢字構形的認知「檔案櫃」

人類認識世界，始於分類與範疇化。我們將紛繁複雜的個體、無限多樣的個體經驗，歸入不同抽象層級的「類別」或「範疇」之中，從而化繁為簡，建立秩序，實現有效的記憶與思維。漢字從根本說，就是一種系統性的、視覺化的範疇化行為。

一個漢字的部首，在認知上往往扮演著一個「上位範疇」或「類別標籤」的角色。例如，「木」部標示了所有與樹木、木材、植物相關概念的一個大類；「心」部標示了與內心活動、情感、思維相關的概念類別。這是一種高效的認知經濟策略：看到部首，即可對字義的大致領域進行快速定位。而部首之外的構件（包括傳統所謂的「聲符」），則負責標明該字在這一上位範疇下的具體特徵、下屬類別（基本層級範疇）、獨特功能或狀態。例如「松」、「柏」、「梅」、「柳」同在「木」部，其區別性特徵就由「公」、「白」、「每」、「卯」這些構件來標示，而這些構件本身也攜帶著特定的意象。如「公」具「背私、散發」之意象，此處表意松樹的樹葉特徵；「白」有「天高雲淡之色」的意象（雲高則白），此處表意柏樹的樹露有洗眼明目的作用（中醫）；

---

<sup>10</sup> Noam Chomsky: 《Language and Mind》,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每」的構形有「人皆母生」的意象，此處表意母親愛吃的果樹；「卯」有「關口、閘口」的意象（水岸），此處表意為喜於水岸生長之樹木。這種分類思維，並非基於僵化的、充要條件的「定義屬性」（如「鳥」必須「會飛」、「有羽毛」），而更接近靈活的「原型理論」。在我們的心智中，存在著一個範疇「原型」，即最典型、最核心的成員（如麻雀是「鳥」的原型）。其他成員根據與原型的相似性被歸入該範疇（鴛鴦雖不會飛，但因其他特徵如喙、卵生等與原型相似，仍被歸為鳥類）。漢字構形也體現了這種原型思維。「概」字，從木從既，其構形意象是用「概」板（一種木製工具）刮平斗斛等量器口沿的糧食，取一個不多不少的平均值、標準量——這本身就是「原型」、「標準」、「一般情況」思維的絕妙視覺體現。因此，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結構，首先是在心智中對混沌的經驗進行切割，劃分出各種層級化的範疇體系，以便給任何對象一個認知位置；其次，才是研究並標記這個對象的具體特徵。這種認知結構關係會直接反映在語言最底層的表徵中。漢字的構形系統，恰恰是這種認知結構關係的直接視覺投射。它先以部首建立「類別櫃」，再以其他構件為每個成員貼上「特徵標籤」。這種作法依古漢人的說法，就是「格物致知」：所謂「格物」就是給事物分門別類，像中藥鋪把各種藥材放在大面櫃中的各個方形抽屜櫃內，這種不同藥材置入其各自的方「格」藥櫃內的過程就是對事物的分類範疇化；而每個方格內的藥名就相當於認知對象的名稱，其藥性就是事物的特性。如此，經過範疇化與特徵性的認知，才是「致知」的結果，即認識事物。

## （二）概念隱喻：從具體「意象圖景」到抽象「字義」的認知橋樑

對於大量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概念（如時間、情感、道德，關係），古人如何為其造出可見的字形？答案是：依賴無所不在的隱喻思維。認知語言學研究表明，隱喻不僅是文學修辭，更是人類根深蒂固的基本思維方式，即用具體的、身體的、熟悉的經驗領域（來源域）去理解和建構抽象的、陌生的概念領域（目標域）。

漢字構形，本質上就是一個龐大的、凝固的隱喻系統。字的構形提供的是一個具體的、常源自身體或日常經驗的「來源域」意象，而這個字形最終所要表達的字義，則是抽象的「目標域」概念。構形是隱喻的視覺載體，字義是隱喻的認知目標。

例如，「閒」字，從門從月。其構形提供的生動意象是「門扉縫隙中透見的月光」。這是一個具體、寧靜、富有美感的優哉夜晚場景。通過隱喻的系統「映射」，這個「縫隙透光」的具體意象，被用來理解和表達一系列抽象概念：空間上的「間隙」、「空暇」；時間上的「間隔」、「閒暇」；人際關係上的「間隔」、「離開」；乃至狀態上的「清閒」、「安靜」。構形意象與抽象字義之間，通過隱喻的認知橋樑牢固聯結。同樣，「道理」的「道」，從辵從

首，意象為「像首領引導運行的能力」，隱喻「事物發展所遵循的途徑、規律」；「理」字，從玉從里，意象為「權力（玉在古代象徵權力）整治後如玉紋有條不紊」，隱喻「梳理事物使之有條不紊」。又例如前述的「格物」，「格」原本是名詞（方形藥櫃），但從西方語法的角度看，「格物」中的「格」此處成了動詞；而從認知隱喻的角度，「格物」的組合意象是指「把事物如草藥分門別類置入方格藥櫃」，這裡的「格」是一種隱喻，隱喻「給事物分類如置入方格藥櫃一樣」。

### (三) 基模理論：激活構形背後的「認知劇場」與動態情境

單個的構件是靜止的、孤立的筆畫或符號。它們如何能夠組合成一個充滿動感、情境、甚至敘事性的完整意義？這就需要「基模」（Schemas）理論出場。基模是我們心智中組織知識的預設性心理框架或結構，它通常以一個典型的場景、事件序列、行動模式或關係網絡為核心。它是我們理解新經驗的背景腳本。

當我們解讀某些漢字時，實際上是在激活一個或多個特定的「認知基模」，並將構件放入這個基模中來理解其角色與關係。例如，要理解「取」字（從耳從又），就需要激活古代戰爭中「割耳記功」這種軍事獎勵制基模；理解「格物」需激活「中醫藥鋪從方格藥櫃抓藥」這種基模。

更為精妙的是，一些看似簡單的字，在特定基模下其意義豁然開朗。例如「找」字，從手從戈。如果孤立看，是「手」和「戈」（兵器）組合，但若激活冷兵器時代的「戰場敵我識別」基模（可以從足球賽場或籃球賽場經驗代替），那麼手握著戈，雙方混戰中辨識目標的探尋的動態意象使躍然紙上，精準表達了「尋找」之意。同樣，「我」字也在「戰場敵我識別」基模中——手握著戈——於雙方混戰中找到己方標示，那麼我們也就輕易理解了「我」比「找」字為什麼多那一撇了。又如「乍」字的構形，在木工「布手知尺」作業基模背景下，我們可以輕易理解「張開拇指與食指丈量木材長度的動作」，包括該字的多義。基模，為冰冷的線條構形注入了生命的活力、行為的邏輯與情境的溫度，使字形成為一個微型「認知劇場」。

### (四) 完形心理：漢字作為一個「視覺整體」的強制力

我們對世界的視知覺，並非被動接收一堆離散的碎片，而是大腦主動遵循一系列「完形法則」，將視知覺元素組織成穩定、簡潔、富有意義的整體形式；換言之，我們不會只是經驗到一群紊亂、無法理解且無組織的感覺元素，而是將知覺陣列中的物體組織成一致的群組；其中一種帶來秩序和連貫性知覺的方式是將類似的事物加以組織，透過這種方式可以減少需要被處理的事物數量，可以更容易地決定哪些事物是在一起或屬於同一事物。漢字作為二維平面的符號

結合，其構形所建構的意象，深刻而自覺地利用了這種強制力，以增強其識別性、區別性和表意性。

⊙封閉性原則：我們傾向於封閉或趨於封閉的輪廓線視為一個獨立的整體對象。漢字中的「口」等部首或構件，利用這一法則，強制性地將內部空間感知為一個領域、範圍或容器。如「國」字（從口從或）中的「口」，確立了疆域的封閉性、邊界感，其意象為「國之境，或為不確定，須依強大武力維持」。又如「囚」字，凸顯了人被拘禁於封閉空間的意象。又如「夬」、「匹」，雖然缺了一角，我們會傾向於把它們看成「央」和「四」的部分；而透過「央」、「四」我們才理解，「夬」是「有缺口或不完整的」的意象；「匹」是「四丈布帛缺對面人手紮緊」的意象（配對）。

⊙對稱與均衡原則：我們對對稱、均衡的圖形有天然的偏好和穩定感。我們傾向於從物體中央將體視為鏡像。漢字構形廣泛運用軸對稱，如「非」、「卡」等字靠中軸或上下對稱，利用視覺平衡與穩定建立經驗意象。「非」字為「丰」字從中間切割去除雜質枝葉的意象，表意為「否定、違反」等義。「卡」字，從上從下，意象為被「上下」卡住，生動傳達了「不上不下、被卡住」的平衡態。更多的體例反映在多字詞中，如「左右」、「東西」、「道理」（「道」為形而上，「理」為形而下）等等。

⊙圖形-背景原則：在視野裡，有些物體（圖形）似乎比較突出，而視野中的其他部分似乎退到後面變成背景。在漢字構形中，常有創設的構形需要聯想到背景才能完成整體意象。例如，「火」字，它由「人冒汗」的意象構形（突出），使人聯想到「火」與「熱」（背景）的字義。又如「重」字，由「千里」構形，其意象是「如遠行身上的行囊（感受）」來整合「重」的概念。又如「好」字，「女」為突出的焦點，「子」是背景（小輩、少年）。

⊙連續性原則：我們會傾向於將形狀知覺成連續、平順、流動的，而非中斷或不連續的。漢字中也有這種連續性原則的構形法。例如，「存」與「在」由「有」和「子」、「土」組合，而「有」是一個不完整的構形，需要我們透過完形原則把它連續完整。於是，「有子、有土」就是一種時空存在。

⊙接近性原則：當我們知覺各種物體時，會傾向於將彼此靠近的物體，看成是同一個群組。例如，「高」就是對古代城樓各種特徵的集成。又如「鬲」也是對古代食物容器（簋）的特徵集成。

⊙相似性原則：我們會傾向利用物體的相似性將之歸類。例如，「友」字，其意象就是兩隻相似的手相握。又如「比」字，其意象是兩個匕相對比（同類相

比)。又如「回」字，兩個內外「口」表示「出去和回來」的意象（兩「口」相似）。

總之，完形法則確保了漢字作為一個二維視覺整體的被理解性，其效力遠超線性排列的拼音文字。

#### 四、結語：走向統一的中文認知文法

本書的緒論，是一場從批判到建構的思想跋涉。我們從中文文法研究的歷史困境出發，穿越了西方理論的迷障與傳統學說的盲區，最後抵達一片以認知科學為燈塔的新大陸。這不僅是一次研究範式的轉向，更是一場關乎中文學術主體的自覺革命。在此，我們有必要對前行之路進行回顧與提煉，並明確這一場革命所指向的未來——一個從漢字構形出發，貫通詞法與句法，最終揭示中文作為表意系統與內在統一性的認知文法體系。

##### (一) 困境溯源與雙重錯位的終點

中文文法研究自《馬式文通》以來，長期陷入「雙重錯位」的泥潭。第一重錯位，在於理論基石的誤植。現代語言學誕生於印歐語系的土壤，是一套為表音文字量身定制的科學。其核心是「語音中心主義」。將文字視為語音的附庸與記錄，語言能力的研究僅來自於口語行為的分析。這套理論框架，如同為流動的聲音設計樂譜，當它被強行用於分析漢字這種為凝固的意象而生成的視覺符號系統時，工具與對象的根本性不匹配，導致了長期的「隔靴搔癢」。我們用研究耳朵聽聞的理論，去解剖為眼睛設計的系統，其謬誤不言自明。

第二重錯位，在於解釋體系的失靈。這不僅是西方理論的「水土不服」，更是傳統漢字研究自身的天花板。「六書」理論面對佔主流的楷書形聲字已力不從心，而後世對「聲符」概念的集體誤讀——將其狹隘化為純粹表音的記號——更是從內部閹割了漢字表意的完整性。這導致構詞法（詞法）這一文法基石，始終未能建立在漢字構形這一最客觀的現象之上。於是，在此鬆軟沙地上構建的句法大廈，自然搖搖欲墜。中文文法體系長期以來，實則是一座缺乏微觀意義編碼地基的空中樓閣。

##### (二) 回歸本體：漢字作為視覺化的認知「化石」

出路在於徹底的範式革命：勇敢拋棄不合身的西方理論外衣，回歸「漢字構形」這一根本客觀現象本身。我們必須正視，漢字的本質是表意文字，其構形是對詞義概念的理解與經驗意象進行視覺編碼的成果。一個漢字，不是一組聲音的拼圖，而是一幅意義的「認知快照」。它直接關聯的是意義和意象，而非語音。這種編碼行為，深刻反映了人類心智如何理解、分類和表徵世界。

因此，漢語的「言語系統」（口語）與「書寫系統」（漢字），在本質上是兩套並行且性質迥異的符號系統。它們通過社會約定產生歷史關聯，但並未合二為一。字音是區域性、時代性的社會約定附著物，而形義關聯則是跨時空、相對穩定的認知結構體現。確立中文研究的主體性，起點就在於旗幟鮮明地承認並深入研究漢字作為獨立視覺表意系統的獨特性。

### (三) 掃清盲點：「聲符」迷霧的認知祛魅

這場革命的核心戰役之一，是掃清籠罩在漢字構形研究上的最大盲點——對「聲符」的迷信。我們系統地論證了，傳統「形符表義，聲符表音」的二分法，是一場持續千年的集體誤讀。所謂「聲符」，其本質是表意的「象符」或「意符」。許慎「取譬相成」中的「聲」，古義豐富，常包含語義內涵。「取譬」完全可以取其意象特徵以譬喻成全字義。

從「江」、「河」等字的深度認知分析可見，被選為聲符的構件（如「工」、「可」），其選擇絕非語音的任意指定，而是表意活動的有機組成。它們與形符（部首）協作，構成「類」（範疇）與「象」（特徵）的認知組合。將這些構件視為純粹表音符號，無異於主動放棄了理解先民造字智慧的一半鑰匙。北宋「右文說」的靈光一現，已為此提供了歷史先聲，可惜因缺乏系統理論支撐而中斷。我們的使命，正是接續許慎未竟的體系化事業，以認知科學為羅盤，對漢字構件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認知考古」，系統還原每一個構件的表意功能與意象網絡。

### (四) 認知工具箱：開啟黑箱的四把鑰匙

為了解析漢字構形背後的認知黑箱，我們引入了四把環環相扣的理論鑰匙，它們構成了一個從概念形成到意義建構的完整光譜：

1. 概念分類與範疇化：漢字構形是人類範疇化思維的視覺實踐。部首標示上位範疇，其他構形則標明其下的具體特徵或下屬類別。這體現了靈活的「原型思維」，而非僵化的定義屬性。
2. 概念隱喻：漢字是凝固的隱喻系統。對於抽象概念，古人通過隱喻思維，用具體的、身體的經驗意象（來源域）來建構字形，表達抽象意義（目標域）。如「閒」（門隙見月）隱喻間隙、閒暇，「道」（首領引導）隱喻規律途徑。
3. 基模理論：單個構件的組合意義，需要特定的心智「基模」（如古代戰爭割耳記功、中藥鋪方格櫃抓藥）中被激活和理解。基模提供了動態的情境框架，使靜止的構件煥發出敘事性的生命。
4. 完形原則：漢字作為二維視覺整體，其設計不自覺地利用了封閉、對稱性、

圖形—背景、連續性、接近性、相似性等完形原則，以確保其作為一個緊湊、穩定、易識別的完形被感知和理解，效力遠超線性排列的拼音文字。

這四種理論並非並列的工具清單，而是揭示了從心智範疇化（分類）、到跨域映射（隱喻）、到情境整合（基模）、再到整體感知（完形）的完整認知鏈條。漢字的創造與理解，正是這一鏈條的生動體現。

#### (五) 統一文法：從微觀編碼到宏觀組裝的認知連續體

至此，我們描述了一幅中文認知文法體系的藍圖。其核心主張是：中文文法是一個以漢字構形為起點，以認知邏輯為貫穿線索的連續統一體。

⊙字內詞法（微觀編碼）：單個漢字（作為單音節詞）的構形，是對一個概念意義的視覺編碼。其構件組合，遵循著分類、隱喻等認知規則，形成一個自治的意象單元。這是意義創造的原子層級。

⊙字間詞法（中觀組合）：由字組合多字詞（複合詞如「道路」、「理解」），其本質是字內意象的擴展與互動。其組合邏輯與字內構件組合的認知邏輯是相同的，只不過是更多的構形組合在線性空間上的序列擴大。在音節上則由單音節擴增為多音節。

⊙句法（宏觀組裝）：由詞組組成句子，是更宏觀的意義裝組。其底層邏輯，依然是概念關係的建立與意象場景的建構。主謂、動賓、偏正等句法關係，可以視為更高層級的認知關係（如行動者—動作、動作—對象、屬性—主體）於句子結構中語言實現。例如，句子的基本結構  $S \rightarrow NP VP$ ，這種  $NP VP$  的組合結構正是由認知規則中的概念模式支配。

因此，詞法與句法並非割裂的兩個模塊，而是同一種認知邏輯——即人類如何對經驗進行範疇化、提取特徵、建立關係、組織意義——在不同語言層級（字內、字間、句內）上的連續性展現。前者是後者的微觀基石與邏輯原型。唯有照亮字內部的認知黑箱，才能透視整體中文文法大廈的內部鋼筋結構。這套體系與印歐語法體系是為解決不同性質符號系統（表音 VS 表意）問題而並行於世的兩套方案，無分高下，唯有真假之辨——即是否忠實於自身對象的本質。

#### (六) 語言本質：作為多模態的心智之鏡

我們的探索，最終與對「語言的本質」的追問相呼應。喬姆斯基曾言，研究語

言是為揭示人類心智的固有特性。我們的研究路徑與此深度共鳴，並提供了來自表意文字維度的獨特印證。

語言，在本質上，不過是認知的「外衣」，它是人類為表徵和交際目的在物質界面上對認知進行編碼的多模態符號系統。語音（口語）和視覺圖形（文字）是其中兩種最主要但性質不同的通道（語言行為）。西方語言學的「語音中心主義」，實則將多模態的語言本質狹隘化為單一的聽覺——發聲通道。而漢字研究從視覺通道切入，強有力地證明：語言行為可以獨立且系統地透過視覺符號進行編碼和運算；意義的表徵與組合，可以脫離聲音的線性流，在二維空間中通過意象的並置與整合來完成。

漢字，作為一種高度發達的純粹意義視覺編碼系統，正是古代先民認知模式、概念結構、思維方式最直接、最系統的「化石」記錄。通過認知科學的鏡頭解讀這些「化石」，我們不僅是在破解中文的密碼，更是在參與一項人類心智如何通過不同模態創造和理解意義的普遍事業。這使得中文文法研究，從一種區域性的語言學課題，上升為關乎人類認知與符號本質的哲學性探索。

本書的旅程始於對困境的清醒審視，成於對本體的堅決回歸，並藉助於認知科學的銳利工具，終於描繪出一個嶄新體系的輪廓。這不是終點，而是一個堅實的起點。未來的道路，要求我們以楷書字體為穩定的共時平面，對數以萬計的漢字及其構件展開系統性的「認知釋字」工程，並將從中提煉出的規則，不斷驗證和擴展到詞法與句法的分析之中，逐步構建起一個層次清晰、邏輯自洽、解釋力強大的中文認知文法體系。

這是一場重歸主體的學術長征。其意義，不僅在於為中文研究找到屬於自己的話語與方法，更在於向世界展示，人類語言與思維的豐富性遠超單一模式的想象。當表意文字的認知密碼被逐一破譯，我們所見證的，將不僅是一套語言文法的重生，更是一扇通向華夏先民乃至人類共通心智奧秘的宏偉之門，由此緩緩開啟。